

李学勤 主编

廖名春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 出土简帛丛考

新出简帛研究丛书第二辑

出土簡牘文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K877.52/10

新出简帛研究丛书第二辑

# 出土简帛丛考

廖名春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SBL74/08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土简帛丛考/廖名春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李学勤主编)

ISBN 7-5351-3703-2

I. 出… II. 廖… III. ①简(考古) - 研究②帛书 - 研究 IV. K877.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2880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黄冈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版 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字 数:191 千字

(438000 · 黄冈市八一路 9 号)  
4 插页 9 印张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51-3703-2/G · 3011

定价:2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 总 序

呈献在诸位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现今学术界的一项前沿研究，即简帛书籍研究的最新成果。

历史上每个时期的学术研究都有其前沿，而什么是当时的前沿，常是由一些重大的发现决定的。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近年已成为热门。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有学术价值极高的简帛材料公布，这方面研究更明显地处于前沿地位，形成国内外学者集中的焦点。一系列新发现的讯息，在会议或著作里提出的观点，都屡次为媒体突出报导，吸引着公众的注意。什么是简帛，简帛有哪些内容，研究简帛有怎样的意义，对学术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简帛乃是中国古人用来书写文字的主要载体。简制以竹木，至少在商朝即已有了；帛则是丝织品，作为书写材料要晚一些。简帛的性质，大体说可以区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其他如书信、遣策等当附属于后者。简帛在古时非常普遍，然而因为质地脆弱易坏，多已消失无存，只有少数幸得保留于地下，为后人发现。

大家知道，历史上为人艳称的这方面发现，有“孔壁”、“汲冢”。“孔壁”系西汉景帝末年，封于曲阜的鲁共王修建宫室，拆毁孔子宅墙，发现了为逃避秦火匿藏的书籍，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汲冢”是西晋武帝时，汲郡人盗发战国魏墓，出土竹简七十五篇，有《纪年》、《师春》、《琐语》及《易经》等。这两次发现都是书籍，在学术上造成很大影响。此外，史书所记零星发现还有不少，只是不如这两次量多，

影响也很小而已。过去发现的这些材料，原物均未留传下来，今人无法得见。

现代发现简帛，始于百年以前，即上一个世纪交替的时候。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瑞典斯文赫定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二十七年（1901）英国所派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都发现了木简，年代多为魏晋。此后西北木简出土不绝于书，但性质系以文书为主，其间书籍很少，而且限于初学用书及占卜小术之类。

书籍的集中出土，首推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盗掘发现的一批帛书。不过其文字不易释读，加上除一件完整的以外长期没有著录，在学术界的影响有限。后来，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所出竹简有一些被指为“最早的战国竹书”，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仪礼》木简，也很珍贵，但只是在专业学界范围内得到重视。

70年代初，情况有了急遽的转变。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大量竹简书籍，包括《吴孙子》即《孙子兵法》、《齐孙子》即《孙臆兵法》、《六韬》、《尉繚子》等兵书，以及《晏子春秋》等等。两《孙子》的并出，消除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疑谜，引起了震动性的效应。随之，1973年发现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1975年发现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1977年发现的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等等，一波接着一波，构成了影响深远的浪潮。大量简帛“惊人秘籍”的出现，迫使学者们对学术思想史的若干根本问题作重新审查和思考。

与70年代发现的简帛书籍年代为秦汉不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乃是战国中期不晚于公元前300年的竹简佚书，而且兼有儒、道的著作。这批竹简于1998年5月公布，立即把简帛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关于这一点，只要看郭店简整理报告出版当月，在中国和美国都召开了专门的研讨会，便足以说

明。在美国达慕思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已辑为《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一书，先后出了英文版与中文版。

另一批楚简，发现时间估计同郭店简差不多，其年代也相接近，1994年入藏于上海博物馆。上博简包括儒家等方面书籍，据报导有约八十种，也激起学者的极大兴趣。

郭店简、上博简的讨论，迅即成为各次有关研讨会的中心。这样的会议，可举出1999年10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8月在北京大学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9月在长沙的“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在清华大学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在上海大学的“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在安徽大学的“新世纪历史文献前沿论坛研讨会”。会议的频率加增，显示出学术界热度的升高。

简帛书籍的发现研究作为学术的前沿，带动了不少学科的进步，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关系最直接、影响最重大的，显然是学术思想史。我曾再三说过，由于简帛的出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这是没有任何夸张的。实际上，因为新发现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古代学术思想看法的改变，同时也必然波及到后世，一直到近代若干学术思想问题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关于20世纪学术思想史中疑古思潮的讨论，可说是很好的例子。

1998年9月，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了“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会上不少学者在讲话里提到简帛研究在该方面的作用。疑古的一个主要内涵，是对古书的怀疑，而简帛书籍的发现，确实给了大家很好的机会，对疑古思潮所达到的结果进行衡量。国内外都有些学者担心，在疑古的论点被否定后，将导致

陈旧的信古的复归。我以为这种“危惧”其实是不必要的，简帛研究所带来的只是对传世古书更严密、更实事求是的考订审查。对于疑古思潮的进步性应有充分肯定，对其不足及副作用则须补充和修正，并提高到方法论上来反省。国内已有若干论作谈及这类问题，国外也有学者论到（如浅野裕一《战国楚简与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再检讨》，《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六号，2002年3月），这也是简帛研究影响的一种重要表现。

清华大学鉴于这方面研究的前沿意义，在1999年秋天启动了基础研究项目“出土简帛与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承担这一项目的，除思想文化研究所外，还有中文系和法学院的学者。我们举行了简帛讲读班，设置了系统讲座，编印了《清华简帛研究》第一、二辑，与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论文集》，并同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一起主办了上面提到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研讨会”。研究所还培养有关方向的研究生。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得到很多位同行学者专家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在这里要特别表示感谢。

目前简帛书籍的研究正是方兴未艾，不断有新材料出现发表，内容珍异，种类繁多，促使整理与研究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继续发展，新的成果层出不穷。现在这套丛书就是环绕简帛与学术思想这一前沿主题，作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出版丛书的湖北教育出版社。读者都熟悉，湖北教育出版社历来印行过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各位编辑先生从一开始就关切我们的项目，给予多方面的协助，现在又投入大量心力，使这套丛书及早问世，对此我们当长志不忘。

李学勤

2002年10月18日于清华园

## 前 言

本书是我探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的一部论集，分为三编十八章。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湖北、湖南两地出土的竹书、帛书，故以“出土简帛”概之；内容以微观性的考据为主，虽然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形式还是较为随意，故名之为“丛考”。

第一编《上博简初探》，共六章。对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特别是《诗论》简，作了系统的探讨。其中：

第一章将上博论《诗》的二十九简分为两种，认为简头简尾都留空的六简，即简二至简七当归为一类，单独成篇；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简一和简八至简二九，它们和“三王者之作”诸简内容既有联系，书法也同，书写形制无别，当同属一篇。并由此作出了上博《诗论》简的新释文。曾以《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之名刊于《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

第二章认为上博二十九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中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子羔《诗》说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而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曾以《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之名刊于《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

第三章通过考释上博《诗论》简七、二两简简文，探讨了孔子及其后学的天命论和“诚”论，认为孔子后学、子思等重“诚”，应该源于孔子；所谓“诚”不只是“真实无妄”，而充满

了“仁”的价值内涵；孔子及其后学虽然有天命论的思想，但凸显的却是至诚之仁，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曾以《上博〈诗论〉简的天命论和“诚”论》之名刊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9期。

第四章对上博《诗论》简“以礼说《诗》”的内容试加探讨，具体考察了《木瓜》诗说、“宾赠”、《大田》诗说、《鹿鸣》诗说等问题，发现“以礼说《诗》”既非始于郑《笺》，亦非始于毛《传》，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就已如此。2002年5月曾以《上博〈诗论〉简“以礼说诗”初探》之名在台湾师大国际儒道学术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过。

第五章是关于上博《诗论》简的一些校释意见，包括简文的隶定、释读、逸《诗》的探讨、残简的缀合、缺文的试补等。其内容节选自曾刊于《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的《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等文。

第六章对上海博物馆藏《鲁邦大旱》简的重要记载做了初步考释。认为“鲁邦大旱”当在鲁哀公十五年；简文“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说表现了孔子肯定治国当刑德赏罚并用，主张“正名”和“神道设教”；简文的记载，虽不见于他书，但真实可靠，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曾以《上博简〈鲁邦大旱〉札记》之名刊于《二〇〇〇年中国博士后学术大会论文集·农林与西部发展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第二编《郭店简刍议》，共七章。或考释郭店简的文字、讨论其简序、试补其缺文，或利用郭店简的材料探讨学术史上的问题。其中：

第七章探讨了郭店简《太一生水》篇的编连和缀补问题，认为简九当置于简一二后，简八的缺文当补为“圣，不知此之谓冥”，简一二的缺文当补为“地道贱强”，简九的缺文当补为

“弱。何谓也？天不足”，简一三的缺文当补为“厚而壮。不足于上”，郭店简《太一生水》篇不存在脱简的问题，其文字可以复原，当属一篇基本完整的文献。

第八章以郭店简《五行》篇与帛书《五行》篇的《经》文和《说》文相互对勘，对其尚未解决的七个疑难问题进行了系统考释，得出了崭新的结论，对于读通简、帛《五行》篇，准确把握其思想具有基础研究意义。曾以《郭店楚简〈五行〉篇校释札记》之名刊于《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

第九章考释了郭店简《穷达以时》、《语丛四》、《尊德义》、《缁衣》、《六德》五篇的从“朱”之字，认为它们或当读为“世”，或当读为“御”，原因就在于“世”本从止得声；而在某楚方言里，“御”也与“止”音近，解决了郭店简这五篇的诸多难题。

第十章考释了郭店楚简、包山楚简、长沙子弹库帛书的“胜”、“失”、“溺”、“曼”、“耑”等字，部分内容曾刊于《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部分内容以论文形式发表于1998年暑假在丹东召开的“汉字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三编《其他简帛发微》，共五章。探讨的对象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扩展到部分传世文献，其中：

第十四章对竹简本《盗跖》篇的内容及其与今本《庄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竹简本《盗跖》篇的篇名“跖”系“𧇧”字之误，而“𧇧”即跖字，又作跖；竹简本《盗跖》篇只包含今本《盗跖》篇的第一章，今本《盗跖》篇的第二、三章当为郭象本原来的第三十篇，后因混入《说剑》而将其与《盗跖》篇合并，遂成为今本《盗跖》篇；从竹简本《盗跖》篇和阜阳双古堆《庄子》残简看，《庄子》一书的内、外篇之分可能早在西汉以前

就已形成,《庄子》书中最晚的杂篇诸作,写成也当在战国时代,它们应是庄子弟子或再传弟子的作品。曾以《庄子盗跖篇探原》之名刊于《文史》第45辑。

第十五章通过对帛书易传三件残片的缀合和考释,认为所谓的帛书《易之义》原篇题当为《衷》,是孔子后学按照阴阳和衷共济的主题所选定的孔子论《易》言论的汇编,编者认为这些言论是最为适当的论《易》之语,故名其为《衷》;而原记字数“二千”当为“四千”之误;同时进一步考定帛书《要》的篇首当为今本《系辞》的第十章。曾以《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之名刊于《周易研究》2002年第5期。

第十六章是笔者对帛书易传《衷》篇重新缀合、重新释文、重加考释所得出的十一条札记,其中有对以前误释的纠正,有新出的文句,有新释出的难字。对于读通帛书易传《衷》篇具有基础意义。

第十七章认为帛书《导引图》的“傴歎”即伛屈,它们是同义复辞,指的是一种屈身俯地的练功招式。这一题记的意义与其图形的情景完全符合,将其理解为病名,或认为是模仿狸猫的动作,皆非正解。曾以《帛书〈导引图〉题记“傴歎”考》之名刊于《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2期。

第十八章将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赋残简与宋玉散体赋加以比较分析,认为宋玉散体赋的大部都出于宋玉,以其为后人伪造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曾以《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之名提交1990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楚辞学会年会,后刊于《求索》1991年第4期。

本书的主体是我跟随李学勤先生从事清华大学“九八五”重点项目“出土简帛与中国思想史”所获得的成果。1999年以来,我们思想文化研究所在李学勤先生的领导下,从事出土简帛研

究，迄今已举办了 26 次小型学术研讨会（每次 30 余人）、两次国际学术座谈会（每次 40 余人）、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100 多人）。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在国外台港发表的有十余篇，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上有十余篇，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有三十余篇。已出版专著九部。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和特邀报告十余次。本书的撰写，得益于李学勤先生在清华为我们开创的这种良好的环境。而这种环境的产生，除本所、本校师生的努力外，也获得了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谢桂华、刘乐贤、赵平安、王志平、李天虹诸先生的大力支持。这都是我应铭刻在心的。湖北教育出版社为本书创造了如此好的出版条件，责任编辑孙艳魁先生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对学术的投入，作者和读者永远也不会遗忘。

十余年来我治学，走的基本是从语言到历史的路子。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三点：一是从微观入手，探讨学术上的重要问题；二是坚持出土材料和传统文献的互证，不是简单地以出土材料来否定传统文献，而是走以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相互发明的路子，努力以出土材料为突破口来诠释传统文献；三是严守学术规范，不做没有新意的工作，观点和论据都以求新为务，对待别人的工作，都要尽可能地予以尊重。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些，愿读者诸君不吝指教。

廖名春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于北京育新花园寓所

# 目 录

|    |         |
|----|---------|
| 总序 | 李学勤 (1) |
| 前言 | (1)     |

## 第一编 上博简初探

|     |                                |      |
|-----|--------------------------------|------|
| 第一章 | 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                  | (1)  |
| 第二章 | 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br>——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 | (13) |
| 第三章 | 上博《诗论》简的天命论和“诚”论               | (25) |
| 第四章 | 上博《诗论》简“以礼说《诗》”初探              | (43) |
| 第五章 | 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札记                | (57) |
| 第六章 | 上博简《鲁邦大旱》札记                    | (79) |

## 第二编 郭店简刍议

|      |                    |       |
|------|--------------------|-------|
| 第七章  | 试论郭店简《太一生水》篇的缀补    | (90)  |
| 第八章  | 郭店楚简《五行》篇校释札记      | (107) |
| 第九章  | 郭店简从“宋”之字考释        | (124) |
| 第十章  | 郭店简文字丛释            | (136) |
| 第十一章 | 郭店简《老子》“鋹鑢为上”考     | (152) |
| 第十二章 | “慎”字本义及其文献释读       | (161) |
| 第十三章 | 从郭店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 | (179) |

### 第三编 其他简帛发微

- 第十四章 竹简本《庄子·盗跖》篇探原 …………… (196)
- 第十五章 试论帛书《衷》的篇名和字数…………… (217)
- 第十六章 帛书《衷》校释札记…………… (230)
- 第十七章 帛书《导引图》题记“備歟”考…………… (259)
- 第十八章 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 (264)

## 第一章 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

盼望已久的上博《诗论》简终于公布了<sup>①</sup>。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图版之清晰，为我所见过的楚简之最；资料的精心排比，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其整理的精湛和用心，也令人叹服。当然，荦路蓝缕，难免有可议之处。这里仅就其《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关于《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问题，2001年以来，我与李学勤先生多有讨论；在清华简帛讲读班第19次研讨会（2001年12月8日）上提交的《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一文中，基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由《简帛研究》网站和《中国哲学》联合举办的讨论会（2001年12月23日）和清华简帛讲读班第20次研讨会（2001年12月29日）上，我也分别阐述过。与此有关的论文，目前我见到的有李学勤先生的《〈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清华简帛讲读班第20次研讨会，2001年12月29日）、李零的《达园会感想》（《简帛研究》网站2000年11月16日）和《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子羔〉篇“孔子诗论”部

---

<sup>①</sup>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

分》(《简帛研究》网站2002年1月4日)、李锐的《孔子诗论简序调整刍议》(清华简帛讲读班第21次研讨会,2002年1月5日)、周凤五的《论上博〈孔子诗论〉竹简留白问题》(2002年1月3日,未刊稿)。这些大作,与我的看法也有同有异。因此,很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 一 简的两种书写形制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编号有29简,加上马承源《释文考释》中所披露的两支<sup>①</sup>,实际是31简。2000年8月在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孔子诗论》图版,编号的就共有31简。前29支,就是今天《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的29简;30、31简,就是马承源《释文考释》中所披露的两支。这31简,从字体来分,当为两种。前29支,为一人所书;后两简,又一人所书,书法明显不同。所以整理者就将后者从《孔子诗论》中剔除了。

前29简虽然书法相同,但从形制上看,也明显是两种。一种是简头简尾都留空的,一种是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据我的分析,简头简尾都留空的,共有6简,它们是简2至简7。简头简尾都写满了字的,当为23简,它们是简8至简29,再加上简1。

这两种形制的简,马承源先生却将它们合在一起。如简1称“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无泯志,乐无泯情,文无泯意”<sup>②</sup>,而上海简《子羔》篇有孔子与子羔论“三王者之作”的

---

<sup>①</sup>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129、135页。

<sup>②</sup> 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